



黑猩猩的政治

——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

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

〔美〕弗朗斯·德瓦尔 著 赵芊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猩猩政治 政治和性在黑猩猩中的表现

Chimpanzee Politics: Politics and Sex among Apes

由 **理查德·P·达利** 和 **安妮·W·普拉特** 编著

译者：**王春华**、**王春霞**、**王春海**、**王春英**

校对：**王春霞**、**王春海**、**王春英**

设计：**王春霞**、**王春海**、**王春英**

排版：**王春霞**、**王春海**、**王春英**

印刷：**王春霞**、**王春海**、**王春英**

装订：**王春霞**、**王春海**、**王春英**

出版：**王春霞**、**王春海**、**王春英**

发行：**王春霞**、**王春海**、**王春英**

印数：1—1000

赵英里译

黑猩猩的政治 ——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 / (美) 德瓦尔(De Waal, F.)著；赵芳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6

书名原文：Chimpanzee Politics
ISBN 978 - 7 - 5327 - 4744 - 3

I. 黑... II. ①德... ②赵... III. 黑猩猩—动物行为一研究 IV. Q959.8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3621 号

Frans de Waal

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

1982, 1989, 1998, 2007 Frans de Waal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图字: 09 - 2008 - 297 号

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

[美] 弗朗斯·德瓦尔 / 著 赵芳里 / 译

责任编辑/戴 虹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10 字数 178,000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8,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4744 - 3/G · 158

定价: 3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 021 - 69113557

渴求和睦、克制、慈爱的动物文明

——《黑猩猩的政治》推荐序

田 松

一个月来,我在公共汽车上陆陆续续地读完了这部动物行为学著作的校样,《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常常不由自主地发出会心的微笑,读得舍不得下车。

弗朗斯·德瓦尔是美国的灵长类动物学家,1975年,他来到荷兰阿纳姆的一个动物园,对那里的黑猩猩进行了连续多年的观察,写下了这部著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25周年纪念版。动物行为学强调观察,观察没有人类干预情况下的动物活动,而不像动物心理学那样,为了研究相对抽象的动物行为规律,设计种种特殊的情境,把动物当作实验的对象。

阿纳姆的黑猩猩每一个都有名字,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特的、活生生的个体。德瓦尔的观察和描述丰富而细腻,在某种意义上,他所书写的是这群黑猩猩在某一时段(1975—1979),围绕着大妈妈、耶罗恩、鲁伊特、尼基这几个核心角色展开的历史。大妈妈是年长富有威望的雌性,另外几位是这段时间最强壮的雄性,都曾做过阿纳姆雄一号。这是不可重演,不可再现,具有惟一性的历史,而不是抽象的行为。德瓦尔自己也说,要将历史方法引入到他的研究,不仅仅是对黑猩猩的行为进行统计,求其平均值。与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相比,这部著作首先是黑猩猩的历史学和人类学,其次才是黑猩猩的社会学。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已经对这些黑猩猩产生了感情,并为他们的生活和命运而唏嘘感慨。

德瓦尔所观察的虽然不是完全自然条件下的黑猩猩,但已经尽可能地接近了。黑猩猩们几乎生活在一个孤岛上,游客只能在20米之外

隔河而望。如果想近距离观察，需要登上瞭望塔，其间也有 6 米的距离，而且隔着厚厚的玻璃——既防止游客喂食，也防止黑猩猩对人的攻击。虽然这个黑猩猩群落最初的成员是人类强行放在一起的，但在几代繁殖之后，也形成了一个准自然群落。

不过，与野生黑猩猩最大的差别是，这个群体衣食无忧。野生黑猩猩要花一半的时间觅食，而他们可以把全部时间用来从事“精神性的”活动。德瓦尔说，“他们难免会觉得有点儿无聊，结果是他们的社会生活得到了强化。他们有太多的时间来‘社会化’。另外，由于所处的空间有限，他们绝不可能将自己与群体完全隔离开来。”在没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这群必须在一起相处的黑猩猩会结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在以往我们习惯的描述中，动物是野蛮的、崇尚暴力的，常常在生存竞争中斗得你死我活。人类早期也是这样野蛮、暴力。而人类文明的进步，就在于从野蛮走向文明，开始知道妥协，知道分享，并有了向往和平的愿望。我们姑且假设，动物果真是野蛮的、暴力的，那么，在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大家都能吃饱的情况下，还会有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吗？如果人人都有饭吃，动物们会不会从事艺术活动——比如音乐、舞蹈，以至于哲学呢？还是说，动物的本性就是贪婪、自私，永远没有满足，自己吃饱了，也不愿与别人分享，宁可把别人饿死呢？这样的问题一直让我念念不已。

德瓦尔的观察让我有颇多意外，也颇感欣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阿纳姆的黑猩猩表现出了强烈的对于和平的渴望，对于暴力的克制，以及对于妇女和孩子的宽容和关爱。

就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黑猩猩会经常发生暴力纠纷。但是，在冲突过后，黑猩猩会迅速寻求和解。德瓦尔写道：“在一场比赛刚刚结束不到一分钟，两个原先的对手就会急切地跑向对方，长时间热烈地相互亲

吻和拥抱，而后互相帮助对方护理起毛皮来。”“不过，有时候，这种具有强烈情感意味的接触也会在一场冲突结束几小时之后才发生。经过细心观察，我发现：如果对手们没有就他们的纷争达成和解，那么，他们就仍然会处于紧张和疑虑状态。然而，就在那样的时候，坚冰会突然消融，对手中的一方会主动接近另一方。”

友爱、和睦才是黑猩猩社区的常态。在人类社会中，一个村庄的两个家族，或者同一家族内的两个兄弟；一个单位里的两个领导，或者一个办公室里的两个员工，竟然能够长年处于敌对、防范、冲突的状态，在黑猩猩看来，会是多么不可思议啊！这种状态，是黑猩猩无法忍受的。

只有最终恢复到和睦的状态，黑猩猩的内心才会平安。德瓦尔转述了另一位研究者伊冯的故事。一次，伊冯把一个名叫巧蔻的小黑猩猩带到家里，巧蔻很淘气，折腾个不停，惹得伊冯大为光火，把巧蔻训了一顿。巧蔻平静下来，伊冯坐在沙发上看书，把这件事儿给忘了。这时，“巧蔻突然跳上了她的膝盖，将双臂环绕在她的脖子上，然后对着她的嘴唇给了她一个典型的（张着嘴的）黑猩猩式的响吻。”想起童年时，与玩伴相处，伤害从来不是单向的，如果感到同伴受到了伤害，哪怕不认为自己有错，也会内疚、自责，所谓伤人一百，自损八千。直到获得谅解，才会解脱。“巧蔻的拥抱不仅感动了伊冯，还给了她一次深深的情感冲击。她从来不曾期望一只动物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在这里，我们看到，黑猩猩的感情超越了物种的界限。

达成和解的方式很多，德瓦尔还观察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两个雄性黑猩猩在冲突过后，一时无法达成和解，就会有雌性黑猩猩居中调和。德瓦尔感慨地说：“黑猩猩寻求和解的需要是多么强烈，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动物会如此强烈地表现出这种寻求。”

人们常常对某些极度的暴力和残忍斥之为兽性大发。然而，在德

瓦尔的描述中，黑猩猩有着高度的自制力。

“雄黑猩猩们强壮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有能力杀死对手，但也有着自我控制的能力。尼基实质上带有一把刀，然而，在与雌黑猩猩打斗时，他却总是赤手空拳。”尼基是阿纳姆最强壮的雄性黑猩猩，这里说的刀，是指犬牙。“犬牙的使用严格地限制在雄黑猩猩们自己的战斗中，而这种战斗是罕见的，即使在那种时候，黑猩猩们通常也是受一种非常严格的行为规范支配的。”

雄性黑猩猩的战斗常常是有迹可寻的，每次发动武力攻击之前，总要向对方进行一段时间的武力炫示，如果对方在此时表示屈服，实质性的武力攻击就会泯于无形。在武斗中，如果一方示弱，比如逃到一棵树上，武斗也会终止。有意思的是，如果被攻击的一方跑到一位强壮的或者有地位的黑猩猩附近坐下，攻击者就会停止攻击。如果那位强者不愿意庇护这位求助者，则会站起来走开。这与我童年所熟悉的儿童行为非常相似。一个小孩 A 在遭到一个大孩子 B 攻击的时候，会跑到另外一位大孩子 C 身边，不用言语，已经表示了求助的意图，即使 A、C 并不熟悉，甚至互不认识，C 通常也不会拒绝。因为被求助，意味着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认可；而如果拒绝提供帮助，则有他惧怕 B 的意味。在孩子的意识中，胆怯是比失败更加可耻的行为，这会使 C 丧失名誉。这时，如果 B 依然穷追不舍，就会导致 B 与 C 之间的冲突。人与黑猩猩，其相似何其乃尔。

德瓦尔还观察到，在雄性之间发生武斗时，雄一号常常会前往干涉，有些雌黑猩猩也会主动调解，使武斗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在两个最强壮的雄性之间发生武斗的时候，常常会有一方求助于最有地位的雌性黑猩猩，使暴力得到缓冲。

体力常常被认为能够决定动物在群体中的地位。不过，德瓦尔说：

“体力并非是决定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惟一因素,而且,几乎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它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一只黑猩猩能够成为首领,不仅取决于他的体力是否强大,还取决于能否得到广大群众,尤其是雌性黑猩猩的支持。“我们常常倾向于认为,战斗的结果决定社会关系,而在这里,战斗的结果却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德瓦尔还发现,保障群体和谐,保护弱者,保护雌性,是雄一号的职责。鲁伊特是阿纳姆黑猩猩的第二任雄一号,在成功取代前任之后,他就承担了维护群体公平的职责。具体体现是,在两个黑猩猩争斗的时候,站在弱者一边。“一年后,鲁伊特支持输家的比例更进一步上升到 87%,”德瓦尔说,“作为雄一号,鲁伊特本来就应该使自己成为和平与安全的捍卫者,并通过支持弱势者来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因而他的这种行为并不令人吃惊。”而如果雄一号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体力超强,也很难坐稳他的位子。德瓦尔写道:“一个未能保护雌性成员与孩子们的雄一号,在他对他的潜在对手进行反击时,是不能指望得到帮助的。这种现象提示我们,雄一号的控制职责并不完全是一种作为义务的善行,事实上,他的地位依赖于此。”雄性黑猩猩尽管强壮凶猛,他们在对待孩子的时候,却无一例外地宽厚、容忍。

最近读卢风教授与杜维明教授的对话《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颇多启示和共鸣。杜维明教授认为,“在文明对话中,学习是比宽容更谦逊的态度。”如果我们认为动物同样具有文明,我想,杜先生的话也能适用。

人类研究动物,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如果在人类与动物之间,可以建立起一个连续谱,那么,在人类学和动物行为学之间,也可以建立一个连续谱。有意思的是,在阿纳姆的黑猩猩社区刚刚成立的时候,《裸猿》的作者莫里斯曾到场致词。十几年前,他这部离经叛道、耸人听闻的著作曾让我遭受巨大的情感冲击。《裸猿》以描述动物的方式来描述人的行为,可视为是人类的动物行为学,与德瓦尔这本黑猩猩的

人类学，正好位于这个连续谱上的相邻两点。

起初，人类学研究是西方殖民化运动的一部分，研究者常常怀有某种猎奇心理；然后，人类学把进步论（进化论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相信文明人是从原始人或野蛮人进化而来。研究者当然自视为文明人，所以研究原始人类，就是在研究自己的起源。通过对进化到不同阶段的原始人类、传统民族进行研究，就可以排出一个文明进化（进步）的序列，就如从猿到人的化石序列一般。

现在，人类学早已普遍摒弃了进步论，把文化相对主义作为研究的起点。人类学家不再居高临下地看待被研究者，而只是一个观察者。人类学家可以告诉我们，在地球的某个区域，还有一群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的人；他们并不认为这群人比自己落后，也不认为这群人应该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走向现代化。现在，当工业文明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人类社会内部的冲突也日趋激烈，人类学则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反过来观照自身。人类学让我们看到，现代化不是惟一的方向，不是惟一的道路，另外的文明模式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人类学，现代人获得了反思自我的机会，也拥有了借鉴和学习的对象。

把这个命题进一步延伸，动物行为学同样可以给人类提供一面观照自我的镜子。

在获得意外的食物时，雄一号黑猩猩在取走了自己有限的份额之后，就会慷慨地分给大家。相比之下，那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老板们，他们自己已经很有钱了，却忍心从尚未温饱的穷人嘴里夺食；那些热衷于拆迁的人们，竟然敢于把推土机开向还住着人的房子。人与人之间长期的冷酷和冷漠，早已超出黑猩猩所能容忍的心理极限。

如果说，贪婪、自私、残暴并不是黑猩猩的本性，那么，也不应该是人这种灵长类动物的本性。如果人类表现出了贪婪、自私、残暴，那是

人的社会性，而非生物本性，或者说，是所谓文明的结果。今天，人类拥有了比黑猩猩强得多的掌控、侵占物质世界的能力，但是，我们的社会比黑猩猩的更好吗？爱护妇女和儿童，是黑猩猩都会的事情。如果人类把这作为文明的成果而炫耀，那恰恰表明，人类所声称的文明，是大可怀疑的。

人与动物之间，与自己的灵长类亲戚之间，究竟有多遥远的距离？德瓦尔说：“将人类与黑猩猩相比较也可能被看做是对人类的不折不扣的侮辱或者甚至可能比这还要严重，因为这种比较的结果是，人类的动机似乎变得更具动物性了。”（258）在人的社会性和动物性，黑猩猩的动物性和社会性之间，我想，是很难画一条截然的界限的。一方面，人类的行为充满了动物性；另一方面，黑猩猩的行为已经具有了充分的复杂的社会性——耶罗恩、鲁伊特和尼基之间错综复杂的合作与利用的关系，几乎是一部《三国演义》的黑猩猩版。

在当下的一般描述中，人类一向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万物之灵长，相信人类与动物之间有着截然的分别。只是在达尔文之后，人类才意识到自己与猴子是近亲。最开始，文明人还不愿意认这门亲，这种难受的心理，我自己在幼小的时候也曾有所感。

然而，这其实是出自现代性视角的一种表述。人类忘记了自己是动物的一员，是在广泛地接受了现代性思想之后。把人与动物截然分开，并且人类高踞于动物之上，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其实是现代性的一个结果，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渊源。一旦回到我们古老的传统之中，就会看到，人们相信自己与动物是亲戚关系，甚至相信自己的祖先是某种动物，其实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儿。很多传统民族都有这样的神话，而神话，对于先民来说，并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哲学、是历史、还是律法。后现代与前现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目前动物权利以及自然权利的主张，在当下充满了现代性的大多数人看来，是荒谬的，不可思

议的,然而,却是大多数传统民族的生存前提。

我常常被指斥为用前现代来反对现代,而我现在这样的描述,似乎有用动物社会来反对人类社会之嫌,岂不是更加倒退?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德瓦尔追述到,1980年的一天夜里,耶鲁恩和尼基联合行动,对鲁伊特施行了极端的暴力,咬得他遍体鳞伤,还摘除了他的睾丸。鲁伊特伤重,不治而死。这个结局又让我意外和伤感。一个和谐的黑猩猩社区,竟然以这种不和谐的方式收场,真辜负了我对他们的赞美。

或许我可以这样自辩,这种极端行为,相对于人类而言,实在太微小了。我特别强调了黑猩猩的和谐,是想要反衬人类内部的敌意。我想,人类文明的演进,其实把动物之间的可能性,统统放大了,尤其是放大了可能实现的恶。而黑猩猩的行为,则给我们立了一面镜子。

对于本书的内容,译者赵芊里在导读中已经做了精要的介绍。我这里不过是发一发感慨,意在抛砖引玉。是为序。

2009年4月27日

北京 阳光小院

“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

——《黑猩猩的政治》推荐序

德斯蒙德·莫里斯

这本大作传达的信息,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这是一个令我愉快的信息,不过我怀疑它恐怕会使许多人,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感到不快。

千百年来,人们都被告知,人与其他动物是根本不同的,他们只是没有理性的“野蛮的”兽类,而我们则有点像是下凡的天使。尽管这一事实——我们是上进了的猿而不是下凡的天使——听起来让人觉得不是滋味、看起来像是侵犯了人的尊严,但对我来说,将我们看作动物演化这一大光谱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曾经存在过的物种之中最不同寻常、最成功的一种,比那种企图让我们从这个星球上的自然生命主流中分离出来要更令人兴奋得多。

那些一直将我们放在一个特别受尊敬的位置上的人们自然会去寻求我们与猿类之间黑白分明的性质差异:人类是有艺术才能的,而猿类没有;人类是工具的制造者,而猿类不是;人类有语言,而猿类没有;人类拥有政治,而猿类没有。承认我们只不过在这些事情上比其他物种做得更好是不够的,为了满足某些哲学家的自负,差异一直不得不要么全是要么全非。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看起来坚硬的差异逐渐软化并变得模糊起来。1950年代,我已经能够证明黑猩猩所拥有的审美表达能力的萌芽。他们能以简单的素描与油画的形式绘制出看起来受意识控制的图案,能巧妙地处理那些看得见的思想,并通过改变来使得它们多样化。他们的艺术才能还是极为原始的,但的确存在着,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

异只是程度上的。

1960 年代,简·古多尔勇敢地进行了对野生黑猩猩的研究,她成功地观察到,黑猩猩能够对探针状的树枝进行精加工,并用这种工具将白蚁从蚁穴中转移出来。作为工具的制造者,黑猩猩得以加入艺术家的行列。1970 年代,特里克西·加德纳(Trixie Gardner)与她的丈夫一起设法教会了一只黑猩猩美国手语,因而,他们能够与他交流,其他的猿也跟着学会了。现在,事情已很清楚:黑猩猩能学会上百个不同的手势符号,并能将它们组合成简单的陈述或请求。一些语言学家因为这种动物不幸在语法和词序上有所欠缺而拒绝承认这些猿的成就是真正的语言。但这些批评中没有一个能抹杀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与猿类在语言能力上的差异并不像人们以往所相信的那么明显。人类只不过比猿类做得好得多而已,人类与猿类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现在,1980 年代,这一关于黑猩猩的政治的让人耳目一新并令人激动的研究成果终于面世了,它所传达的信息同样是清楚的。我们与我们的多毛亲戚之间的距离其实比人们先前以为有的更近。在我们仔细研究过后,猿类就会向我们展示:他们是擅长精妙的政治策略的。他们的社会生活充满了权力接管、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网络、权力斗争、联盟、分而治之的策略、联合、争端仲裁、集体领导、特权与交易等等。那些在人类世界的权力走廊中出现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是不能在一个黑猩猩群体的政治生活中发现其胚胎的。

要理解为什么只是到现在,到 1980 年代,这一此前一直未搞清楚的黑猩猩们的复杂行为才得以被分析并且才得以发表,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中接近猿的方式。在并不太远的过去,诸如黑猩猩、猩猩特别是大猩猩的大猿还在被人们看作嗜血的妖魔,只有最勇敢的白人猎人才能猎杀他们。这是猿类被看作金刚的阶段。而后,随着年轻的猿类被捕获并被带回到动物园中,人们面对猿的心情发生了变

化。一夜之间，他们从妖魔变成了逗人发笑的小丑。这是黑猩猩的茶会阶段。后来，科学家们开始研究这些引人注目的动物，他们通常都将他们“留在家里”，并几乎像对待人类中的孩子们一样对待他们。这是家里的猿阶段；它引发了科学家对猿类个体智能的重要研究。但这种研究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猿类的社会生活状况。接下来，开始了了不起的野外实地研究；在简·古多尔首开先河之后，其他人也相继跟进；这些野外研究揭开了野生状态中的猿群的复杂社会的许多方面。这是自然状态中的猿阶段。这件事在这一阶段上停留了一段时间，直到安东[Anton]与简·范·霍夫兄弟俩采取了这一大胆的步骤：在荷兰阿纳姆动物园中建立一个真正大型的黑猩猩圈养与繁育基地。

阿纳姆黑猩猩群体在像弗朗斯·德瓦尔这样的动物行为学家的时刻观察的目光下成长、繁育并兴旺起来。站在高高地矗立在孤岛式的群体圈养区一端的观察塔上，他们能够跟踪观察一个猿类群体的社会组织的变化，这种观察所获得的细节比以往任何一种形式的观察所能获得的都要多。正是这种特定的环境将人类对于黑猩猩的行为的理解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比任何对于被拘禁的黑猩猩的其他形式的研究都更自然，比任何野外研究都更详细，阿纳姆研究项目给人们带来的新发现连续不断。没有人——即使是曾经做过黑猩猩研究工作的我们——能猜得到他们将被证明的社会谋略有多么复杂。没有人会想到有朝一日会有人去认真地考虑将一本书命名为《黑猩猩的政治》。然而，读了这个报告，我相信，你们会觉得作者已经完全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会觉得他已经将我们关于我们现存的最亲近的亲戚——复杂得令人着迷的黑猩猩——的知识向前带入了另一个重要阶段。

1982 年写于英国牛津

25周年纪念版前言

如果一本书可以连续行销 25 年，那么，它所谈论的话题肯定具有永恒的魅力。政治就是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浸渍于政治之中，所以，我们立刻便能看出其中的诡计——即使是在人类范围之外的事务。如果我们同意哈罗德·拉斯韦尔关于政治的著名定义——政治是决定“谁在何时并如何获得什么”的社会过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黑猩猩也在从事政治。由于那个过程涉及对于人类或我们的近亲们都适用的各种威胁、结盟与孤立的策略，因而，我们有理由使用某个通用术语。

对某些人来说，这样一本书为贬低人类中的政治家们提供了依据；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又被用来提升猿的地位。也许我们有各种理由来缩小政治家们的膨胀的自我，特别是在当他们自以为拥有这个世界的时候。《黑猩猩的政治》已被有效地用于这一目的。例如，本书法文版的出版者将弗朗索瓦·密特朗和雅克·希拉克共同搂着一只黑猩猩的形象放在了书的封面上！我个人并不觉得这样做有趣。用猿类来嘲笑人类实际上说明我们并没有认真地对待猿类，这与我所想要传达的思想恰恰相反。我更感兴趣的是另一种视角：我们的近亲们的行为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本性的重要线索。除了政治操作外，黑猩猩在许多行为——从工具应用技术到群落之间的战争——上都表现出了与人类的相应行为相似的特征。事实上，正是大量的相似性这一背景才使得我们在灵长类动物中的地位得以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

一个发现的世纪

当柏拉图试图将人类定义为惟一不长羽毛并用两条腿走路的动物

时,他立即遭到了第欧根尼的反驳。第欧根尼在演讲厅中放开一只被拔光了毛的小鸡,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自从那时以来,人类就一直被紧逼着去寻找自己独特性的终极证据。例如,制造工具曾经被看做是人所独有的特性,以至于出现了一本名为《人是工具的制造者》的书。这一定义一直被人们沿用着,直到人们发现野生黑猩猩会用经过特别加工的树枝探入白蚁穴里以获取白蚁这一现象为止。另一种独特性主张与语言有关,这种独特性被界定为交流的符号性。但是,当语言学家得知猿类已经学会美国手势语后,他们又用他们当前所强调的句法替换了他们原来当做必备条件的符号性。人类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成了一种随心所欲的主张或一种像龙门架那样可以移来移去的东西。

我们对猿类知道得越多,他们看起来与我们就越像,正如他们的遗传物质所暗示的那样。人类关于他们的行为的知识积累是从 20 世纪早期的一批实验科学家开始的。沃尔夫冈·科勒曾描述过下述情景:一串香蕉被挂在了手伸不到的地方,房间里有一些可供使用的箱子和棍子,那些试图获得香蕉的黑猩猩会坐在那些东西旁边,直到突然悟出一种解决方案:至今,圈内人士仍将这种灵光一闪的现象称为“科勒瞬间”。罗伯特·耶基斯记录了猿类的性情;娜杰日达·拉德金娜·科茨沿着查尔斯·达尔文的足迹前进,并提供了她养在莫斯科家里的一只雌黑猩猩与她儿子之间面部表情的点对点的对比情况。

人们也在自然栖息地里观察黑猩猩,但在那个时候,在自然栖息地中的工作曾经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因而不被赞成,只有实验室里的实验才被认为能提供科学所要求的可控制性。直到今天,这些不同研究途径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尽管黑猩猩研究的历史实际上是实验室研究与实地考察之间的杂交所产生的力量的展示窗口。黑猩猩行为研究的下一次推进发生在 1930 年代,当时的一些短暂的远足标志着对荒野中的黑猩猩进行研究的最早认真尝试。例如,亨利·尼森在几内